

在 新世纪的门槛上

中国现代诗人新论



郭小聪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

——中国现代诗人新论

郭小聪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中国现代诗人新论/郭小聪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

ISBN 7-301-03378-8

I. 在… II. 郭… III. 现代文学-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 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 第 06581 号

书 名: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中国现代诗人新论

著作责任者:郭小聪

责任编辑:宋祥瑞

标准书号:ISBN 7-301-03378-8/I·423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2018 编辑部 62752032

排 印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19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2.00 元

序

那是一个怎样难以忘怀的时光。一个民族重新陷入大欺骗大愚昧的时代刚刚结束。多少青年人，或已经历过多生活沧桑的磨练，或幸运地刚刚走出中学校门，这样一个年龄不尽相同的知识群体，在几乎同样经过十年的文化沙漠的痛苦滋味之后，怀着对于人类文化知识的最强烈的饥渴感，走进了北京大学这块“圣地”，走进了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个个新的世界的课堂。

他们为了吸吮人类知识宝库为他们提供的一切古老的和新鲜的营养，天天钻图书馆，购买和传阅每一本新出的书，讨论和争吵一些学术问题，为了听课，尽早等在教室门口，抢位置，为此甚至挤碎了门玻璃；他们默默地在拥挤的宿舍里，在图书馆中，勤奋地爬格子，匆忙地涂写，各自做着人生前行的种种美丽的梦。

作为那时给他们上课的教师，我感受到从没有过的讲授者和接受者之间所共同拥有的那一份共鸣的快乐。

经过四年的学习，他们带着眷恋而又充满憧憬的心境，告别美丽的燕园，告别中文系的老师，走向各自人生的岗位。

离别前夕，他们在中文系所在的五院里面的墙上，用几张写满墨迹的彩色的纸，贴出了自己诉说不完的心声。我记得，那信的最后，引述的就是徐志摩《再别康桥》最后的一节诗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们没有带走什么。但他们却留下了许多。这个群体本身就是一首动人的诗。我们通常把这个不会再有的群体叫作“七七级”。郭小聪，就是这个群体中年纪较小的一个成员。

小聪喜欢诗，似乎也写诗。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徐志摩的散文，我是他的指导教师。后来，他继续读王瑶先生的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写的就是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诗歌研究。毕业之后，他到了位于颐和园外东北一隅的国际关系学院任教。在一个远离市声的宁静而充满诗意的环境中，他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诗专题。结合授课，也是他自己的学术爱好，他的研究工作，始终没有离开中国新诗这个大题目。近十年下来，他的辛勤而审慎的耕耘，结出了一束坚实的果实。如今放在我面前的他的这部书稿《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中国现代诗人新论》，就是他这十年劳苦果实的一部分。

这本书是作者研究中国现代重要诗人和流派的一部著作。从内容上看，全书以诗人个体专门研究为主，以对特定历史时期诗人群综合性研究为辅，着重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所研究的每一个课题，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人的论点和见解，并力图以翔实的材料给予论证。每一章的论点，作者均力求做到新颖而有说服力。其中有些篇章，我过去陆续读到过；这次，我又认真读了一遍全书，仍然有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

小聪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为人的真诚。他性情开朗，宁静淡泊，不汲汲于声名，不戚戚于清贫，永远是那么乐观，随和，甚至总是葆有孩子似的天真。即使在多数为新潮流所影响的老师和同龄朋友面前，他也是那么不去人云亦云，毫不掩饰地发表他自己经过思考的意见。他真诚地做人，也真诚地为学。他的关于中国现代新诗的研究文章，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在观照历史的时候，所难得拥有的那份真诚。

此书所论多为现代诗歌史上的著名诗人，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诗歌理论，成就或高或低，个性与风格各异，小聪均能不为前人和长辈的论述所左右，以研究者应有的“史识”，说实话，说真话，说直话，不藏头露尾，不隐晦曲折，不吞吞吐吐，一切按照他的认识——

许多是接近于客观实际的认识,进行论述。有些批评实事求是,有时甚至几近苛刻,但却道出了真情实理。无论是一个诗人的总体倾向的观察,或一种创作现象的总体分析,或者一首诗的具体评价,均能如此。即使在他对现代诗人和流派的论述中,也表现出他在历史的探讨中所得出的一些关于现时性的思考。如他的《郭沫若早期新诗形式探索的启示性意义》一章,探索的是对于诗的音乐化实践的不同途径,他十分重视的不是哪一个诗人的实践所得出的理论结论,而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积累,不断总结的历史过程。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不应拒绝各种尝试。“但也应有原则,就是不能悖离诗歌的本质。现在有些所谓现代派风格的诗完全放弃了诗歌的音乐性,把诗真的写得像家常话,甚至更粗俗,这种尝试,或说这种完全的反叛对新诗会有什么影响吗?有,它使诗不再是诗,它使人们不再读诗,它使诗人们互为读者。诗歌本质上是一种优美、高贵、大度的东西,它属于人类精神世界中的天国部分,不应被亵渎践踏,成为疯狂、偏执、怪诞情绪的居住地。”如他论述闻一多时提出,这位诗人无论如何不应该被简单地放在“新月派”的框架中来考察。又如,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发展,在一个时期中,不为人们所肯定。它的存在与否,也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完全承认。本书的作者,却用很多的篇幅,涉猎这个诗歌潮流,特别是从论艾青,论抗战时期的诗,到论七月诗派,均较多谈及这个问题,鲜明地表示了自己赞成现实主义主潮存在的学术见解。有些论述且十分精到。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论述抗战后期诗歌的时候,他引用诗人力扬于1942年发表的《我们底收获与耕耘》文章中的观点,说明以中国诗歌会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与一直被视为反动逆流的新月派和现代派,“这两支河流,也并不像长江黄河一样,南北分流,丝毫没有脉息相通的地方,而有着许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交点”,由此小聪论述道:在这历史性的合流中,各派诗人融合着对方的长处,克服着自己的缺陷,共同追求着“更有深刻的刻划

与描绘,使表现的方法更能密切地拥抱着现实主义”,因而将抗战前期形成的现实主义诗歌顺利地引向纵深。

作为读者,你尽可以不完全同意他的这些坦率的现实批评和理论见解,但你不能不赞许他拥有的这份艺术真诚。如前面引述的对于当前诗歌创作的不满而产生的近于严酷的批评,小聪在论文中也许可以不说这些话,但他说了,说的那么自然,那么坦率,那么真诚。这正是他的研究中在评鹭历史时候最需要的学术勇气,也是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者最为可贵的品格。

全书中,各章对于每个诗人的研究,并不力求全面周到,而是能够抓住这个诗人最有个性的创作成就和美学追求,抓住他们在现代诗歌发展中最引人注意的侧面,条分缕析,评价论述,并努力从一个独特的审美的角度,给他们以新诗史上的定位。研究中充满了一种动态发展的历史眼光。各章虽然分别撰写,相对独立,连起来读,却能给人一个史的发展轮廓。但因此,这些篇章,也就避去一般史的叙述和描写,能在论述中见其所长。其中的《闻一多作为爱国诗人的独特性》、《戴望舒创作实践与艺术探索的真正重心》、《艾青的艺术个性》、《艾青的艺术技巧》、《林庚在新诗形式方面的独特探索与思考》,以及关于“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论述等章,都能显示出小聪这种把握诗人和流派现象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创新性。这里我特别要说的,是书中的《抗战诗人的历史贡献》一章,因为是在作者的硕士论文基础上扩充改写而成的,花的功夫比起其他文章来均更大些,就能于更广阔也更复杂的背景上,把握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现代诗歌发展的现象和本质,成就与不足,转折和变异,升沉和走向。对于这个时期诗歌的由浮躁走向深沉的历史动因及艺术探求的把握,对于象征在加强抗战诗歌转折中带来传达的成熟性和深沉感方面所起的作用的论述,对于艾青所提倡的“诗的散文美”理论所带来的创作发展上多向创造的辨析,关于“诗的散文美”和“诗散文”之间界限的阐发等等,颇显示出作者具

有的创新性的思考能力。本篇在史料上和论述的思维上,都代表了作者探求新诗史有较大历史跨度问题所具有的研究功力和水平。

中国现代诗歌的研究中一个很大的弱点,是没有把它的文体特性与其他文体区别开来,用一种缺乏独特的灵气和感受的思维和文字,去隔靴搔痒地作一些常规条文式的归纳,或者寻章摘句式地把诗歌当成知识分子思想史的研究资料,加以某种扭曲的运用。诗因为研究而失去了诗的艺术本质和审美品格。小聪的这本书,却没有这个弱点。

小聪是个懂得诗的艺术的人。他对于诗的审美特质,有独特的感觉和敏锐。他能在很多别人习以为常的诗里体味出一些特别的东西。如他对于戴望舒的《我的小母亲》一诗价值的发现,他对于戴望舒早期诗的感伤与诗的忧郁美学品格区别的论述,他在与西方现代诗整体性比较中找出中国现代诗的历史特质,“本文所真正感兴趣的,与其是作为现代派诗人的戴望舒,不如说是戴望舒式的现代派”;特别是他对于艾青的艺术感觉独特性的把握,关于艾青这样的大诗人与一般诗人差异的精辟论述,对于艾青诗歌想像力富于独特感受的阐明,等等,都是一个深谙诗歌三昧的人,才能作出的思考。他的文章,源于史料和作品,有不少还是他自己的发掘,但绝不陷于繁复臃肿的史料引述,任他们冲淡埋没了自己的观点。论述重实证而不拘泥,观点多创新而不躁动,文字求流畅而不浮华,这本现代诗新论,当得起是一部有才气而又扎实之作。小聪对我说:“这里,我没有用什么新的理论方法和名词术语。”这样做,也许显得老成些—对于一个年青的学者来说;但这“老成”,也许就铸进了一份难得的真诚。

自然,因为是富于才气和多艺术悟性的研究,书中虽多精彩理论见解,但也就因此,一些篇章同时伴随着一种毛病,那就是在理论思考上,如“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诚实坦率的真知

灼见有余，而潜深厚重的理论思考尚嫌不足，对于所论现代诗人和诗歌流派中存在的人们渴望解答的一些问题，尚缺乏更富创造性的理论探求的深度，将人们的思考向前推进一步；有些判断，下得比较匆忙和直率，也就会偶露偏颇，倘能再细作推敲，谈得全面些，或可更为准确。有些理论问题，作者说清为止，不作多的停留，但时有匆匆而过之感。这些毛病，在作者行云流水似的文字中，常常被掩盖住了。这里说的，或许只是对于小聪的一种更高的苛求与期待。

“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中国现代诗歌，诞生于本世纪初启蒙大潮崛起的峥嵘岁月。在一个新的诗潮崛起的喧闹中，即将走到这个世纪的尽头，迎来下一个世纪的璀灿的曙色。新诗完成了民族给予它的职责，自身的艺术也收获了许多。中国现代诗的道路曲折而多彩。从胡适、郭沫若，到绿原、穆旦们，从五十年代单调的声音，到九十年代的多向的探索，多少诗人，用他们的心血，用他们的生命，铺出了中国新诗这条带血之路。有多少人为新诗而受难。多少诗人以整个生命探求献于新诗艺术的祭坛。而且，在他们自己的塑像群体中，骄傲地耸立出艾青这样一个伟大诗人的雕像。艾青以他诗的恢宏创造和博大精神，给中国现代诗歌迈进二十世纪世界各民族的诗歌之林，带来了一缕有声有色的希望之光。同时，中国现代诗发展中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许也是新诗发展中永远值得探索的命题，也一直缠绕着许多先行的诗人和无数的后来者的智慧的苦恼。征服苦恼和麻烦，正是人类艺术创造战胜自己的动力。现代诗歌研究者的每一点点努力，都是对于这种探索者苦恼的一种征服。

这本书中的一些篇章，曾作为独立的论文，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希望小聪这部名为《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的中国现代诗人论集，在又一个新世纪到来之前的出版，能带

给关心和热爱新诗发展的人们一些思考与启示。这就够了。

孙玉石

1996年9月10日

引 言

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观照点上,当我们回望本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中国现代新诗运动时,容易感受到宏观考察的气势和力量,也容易产生某种指点江山式的情绪,说起来,还有什么比谈论脚底下一条大河的来龙去脉更让人心胸开阔的事呢?但是,越是在这种情形下,越是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当我们这一辈研究者展开自己的思考时,中国现代新诗史已经有了大致的轮廓,我们之所以能在一个较为清晰的背景下有条不紊地观照对象,正是由于前辈学者的不懈努力。牛顿说他取得成绩是由于站在了前人的肩上。其实这不是个别偶然的,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事。因此,任何一种真正深刻的思想,宏观把握的气魄,都不应当是简单地发生于推倒重来的冲动,也不可能是来自于完全否定前辈的已有成果、自己去凭空构架一个新的体系的臆想。

正像江河是在奔流中由一条条小溪汇聚成的一样,无限多样性的累积构成的却是一个浑然的整一。事实上,不管有多少种版本的文学史出现,我们透过各具特色的体例、风格、观点所最终看到的,还是那同一部文学史主流的壮阔奔腾。作者不管是表示质疑、商榷,或是提出新的见解,都是对已往研究成果做出的反应,都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的思考和总结,都是对那一段文学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或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有权威性的文学史或许只有一部,它是集体的创作,是由一代代学者共同探讨、完成的。

五四新诗的产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

古典诗歌历史的终结,具有划时代意义。对这一阶段诗歌发展的评价和探讨,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就目前的新诗研究而言,我认为,主要工作应是在整体把握的观照下,一点一滴地把我们的智慧集中于对各个细部的研究上,例如围绕某一专门课题进行较深入的、富于个性的探讨,并做相应的对比研究或必要的梳理和归纳。因为现在的时代仍然是一个尝试的时代,探索的时代,累积的时代,如果没有对个别诗人及作品的细致而深入的探讨,对新诗史的综合研究与评价也就缺少坚实的基础与深度。五四新诗的诞生毕竟只是本世纪的事情,新诗即使走在最好的路途上,自身也仍在发展初创期,能够发现和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就不错了,研究者们毕竟还不可能具备宏观把握、准确概括的充足条件和可靠基础。另一方面,还应看到,这一段新诗史的描述,基本上还是属于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了一个较完整的轮廓,但许多细部需要加以丰富、深化。甚至还存在空白,等待引起注意和填补。某些重要论题也不能说已有定论,尚待研究者们通过多样化的探讨求得共识。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着重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在微观的透视和细密的分析上,就显得更为必要和重要了。

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总是需要富于个性的探讨。这很重要。为什么这个人喜欢从这个切入点讨论问题,为什么那个人总愿意采取另一种研究方式,为什么第三个人的做法又与前两个人不同?这与其说是一个问题,不如说是一种正常现象,没有任何理由求全责备或强求一律。实际上,学术研究中只有照顾到研究者的个性特点,才可能找到独特的角度和侧重点,才可能有价值,有成果。正如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贝壳,才能镶嵌成一幅多彩而完整的图景一样,任何一种共识的达成,都需要多样化的思考做底蕴。那种自成体系、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即使有,也毕竟是极少的。重要的是,研究者们要认识自己,开掘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敏感点在哪里,突破口在哪里,适于做什么,不适于做什么,要尊重自己的新鲜

感觉和独特思考,实实在在地说自己确实想说的话。

这本书是一部较为系统的有关现代诗人论的研究专著,又特别着重于“新论”二字。这意味着,我不想为了体现完整性而埋没了真实的研究兴趣,不想为了表示自己有面面俱到的能力而把精力放在左右平衡上。凡是与大家所见略同的地方,我就不想再赘言。在把握具体研究对象时,我也多是从自己确有所感所悟的地方入手,而不愿泛泛而论。说到底,研究的价值和趣味,不就是说自己觉得有新意的话吗?不就是把自己微小的、但是独到的心得汇入那绵长的、宏大的集体创作工程中去吗?罗曼·罗兰曾借《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同名音乐家之口说:“他但求说出自己的感觉,决不问前人有没有说过,他很骄傲地相信,这才是求新奇的最好的办法,世界上不是永远只有一个克利斯朵夫吗?”创作是这样,其实研究也一样。

那么,书中的“历史感”体现在哪里呢?没有表现出深邃历史感的书或文章,无论表面上构架怎么严整,论述怎样绵密,也是一堆没有灵魂贯穿的散乱的文字。在我的研究工作中,当我回旋于自己感兴趣的地方时,无论我每次的切入点是多么不同,无论各章的侧重面是多么不一致,有一点我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致力于考察每个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而“独特性”里,就有“历史感”深藏着,因为对每个研究对象“独特性”的辨识,是只有从历史发展的链条上才能真正见出的,是只有把握了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才可能加以言说的。譬如,本书认为,闻一多无论与新月派的渊源关系有多深,这位诗人也不应简单地被放在“新月派”的框架中来解说,他从本质上更近于郭沫若。其独特性主要在于他把祖国作为唯一的精神恋人,并从纵的时间轴上真实而又曲折地记录了中国人的现实精神苦难。本书对戴望舒的独特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也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戴望舒一生的主要兴趣并不是在对西方现代诗艺的热诚引进上,而是在直接汲取二十年代“新月诗派”经

验教训的情形下,力图使现代新诗的表达在语言、节奏等方面迅速地、最大限度地贴近现代人的生活与感受。再如,本书通过探讨殷夫走上诗坛的时机,经与“湖畔诗人”相比较,论证了这位诗人在新诗史上的独特价值和地位。本书还通过对抗战初期诗人们异乎寻常的普遍乐观情绪的深入分析,找到了二次大战中唯中国所独有的这一文学现象背后深藏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这就是在全民抗战的呼吁中寄寓着民族新生的历史要求,抗战怒潮造成了近百年来民族积郁的总爆发。中华民族精神上的这种凝聚力,即使在历史上最落后、最不幸的时期,也是不可轻视和蔑视的。这一点对敌人是个教训,对历史则是一条经验。总之,可以说,本书中对五四新文学历史的整体性把握和观照,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新的见解,主要是在对于各个细部“独特性”的研究中一点一滴地体现出来的。

本书在具体探讨中,还较为注重艺术审美经验的作用。实际上,对文学史的准确概述,对文艺规律的深入探讨,不仅有赖于抽象概括能力,而且与研究者本人的艺术鉴赏力也是分不开的。莱辛的文艺理论名著《拉奥孔》,令人信服地总结出诗画艺术各自不同的内蕴特点及表现形式,而其德国式的条分缕析,却始终是渗透在对拉奥孔这尊雕像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欣赏和体味中的。有时候,简单的也许是最自然的。好的诗歌作品首先应该是美的艺术结晶,它打动人,感染人,激起读者的敬畏、优美、向善之情,然后才可能成为其他,譬如研究对象、符号象征等等。正是基于此,在研究本世纪大诗人艾青的作品时,我以涌动的审美感受和好奇心为导引,从不同方面进行探索,力图弄明白艾青“为什么会成为艾青”。这种将艺术审美直觉与理论思考相结合的探讨方式,比较富于个性;如果把握得当,就容易得出一些颇有新意的观点、见解来。

总之,无论是确定研究对象,还是选择切入角度,本书各章都力求新颖,实在,通过具体论证,提出一些不同于前人的论点和见解。当然,某些新的论点,也许会引起学术界同仁的兴趣,甚至会

引起争论,这是好事。任何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不正是在研究者们百家争鸣中才不断注入新的活力,逐步走向深入的吗?如果开口仅仅是为了附合前人或别人的见解,不如沉默。在具体写作上,本书以诗人及其作品的专门研究为主,以对诗歌流派及文学现象的综合性研究为辅,基本上是每章研究一位诗人或一个诗人群,但艾青、徐志摩则各分上、下两部分,前者是想从诗学、修辞学两方面入手,而后者则是有意从诗歌、散文两方面对这位两栖作家的创作做出全面评价。

在我的老师孙玉石先生所作的序中,流露出对“七七级”的深沉的怀爱之情。其实,我们这一届学生对母校、对老师们的感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孙老师跟我促膝讨论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强烈地感受到十多年前他指导我学士论文时的场景和氛围。校园葱茏依旧,只是老师们鬓发斑白了,那个百废待兴、求学若渴的年代似乎也远去了……。但老师还在身边,还能给我们宝贵的教诲,教我们求知,教我们做人,这就够了。

在此,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老师们给予我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使我能在自己的母校出版这本微薄之作。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宋祥瑞先生,他的悉心指导和严谨精神使我获益匪浅。

最后,我还想表达我对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原学报主编崔坪先生的怀念和感激之情,他生前的督促使我体会到,前辈的鼓励对后进学人有多么重要。

目 录

序.....	孙玉石(1)
引言.....	(1)
一 郭沫若早期新诗形式探索的启示性意义.....	(1)
二 闻一多作为爱国诗人的独特性	(15)
三 徐志摩诗歌创作的个性魅力	(34)
徐志摩散文创作的个性特点	(48)
四 朱湘诗歌在新诗史上的独特价值	(69)
五 殷夫诗歌的开创性意义	(83)
六 戴望舒创作实践与艺术探索的真正重心	(96)
七 艾青的艺术个性.....	(117)
艾青的艺术技巧.....	(134)
八 林庚在新诗形式方面的独特探索与思考.....	(149)
九 抗战诗人的历史贡献.....	(164)
十 七月派诗人在四十年代诗坛上的独特风貌.....	(195)
十一 九叶派诗人诗歌理论主张的奥突含义.....	(212)

— 郭沫若早期新诗形式 探索的启示性意义

随着二十世纪进入尾声，本世纪初诞生的五四新诗，将留下一些遗产给新的世纪。这笔遗产现在我们还不能打理清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时间越长，选择就将越偏重于文学本身。

作为五四新诗的重要成果之一，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早期诗歌创作，一直被普遍视为现代新诗史的真正开篇。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反复谈论《女神》中充满理想光耀的自我抒情形象、大胆叛逆精神以及渗透在内容和形式中的彻底解放感，为的是——也习惯于从中寻找它与五四时代之间的种种精神联系以及启示意义。但是，当人们谈论了大半个世纪以后，可能会发现，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超出 1922 年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的见解。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就断定了，《女神》之“新”，“最紧要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即《女神》的独特性正在于它惊心动魄的精神风格使新诗无愧于那个伟大时代。接着，闻一多准确分析了诗中那个炫新耀奇、狂放不羁的自我与“五四”一代青年的内在精神联系，“现在的中国青年——‘五四’后之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像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觉得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宇宙真一秒钟也羁留不得了。他们厌这世界，也厌他们自己。于是急躁者归于自杀，忍耐者力图革新”。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